

徐友兰铸学斋藏书 及其与蔡元培之关系

郑伟章

在近代，浙江省绍兴郡有两位姓徐的藏书家，一位是古越藏书楼主人徐树兰，已为世人所熟知；另一位是铸学斋、述史楼主人徐友兰，鲜为人知。这两位藏书家是兄弟俩，在中国近代文化、学术史上都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。尤其是老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与徐氏兄弟都发生过密切交往，但由于徐树兰著名于世，而徐友兰鲜为人知，故许多蔡元培年谱、传记的作者，把蔡元培与徐友兰有关系的史实都记到了徐树兰头上，弄得十分混乱。因此，把徐友兰铸学斋的藏书、刻书活动及他的生平事迹弄清楚，就很有必要了。

一

徐友兰是徐树兰的胞弟，字佩之，号叔蓓，别署八杉斋主人，生于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，比徐树兰小五岁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六月初六日卒，终年六十四岁。薛炳写过一篇《徐友兰传》，保存在《绍兴县志资料·人物列传》上。

友兰在四岁的时候，其父徐云泉把他过继给叔父徐怀瑾为后，叔母章夫人对他“奇爱之”。徐云泉虽把他过继出去了，但仍很关心他的前途，同样希望他走读书做官的道路，曾把他捐入

国子监念书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，他辍学“随本生父经营商业”。同治九年(1870)又重新读书，直到光绪元年(1875)，他已过“而立”之年，才得补为会稽府学生员。《绍兴县志资料·选举志》有徐树兰、蔡元培、李慈铭、平步青、章钰等人以及友兰的儿子徐维则中举的记载，而没有他。到光绪七年(1881)，他已年过四十，本生父不得不为他花一大笔钱，捐了个户部员外郎，在湖广司上行走。是年“入都供职”，次年冬即“乞假归省，自此家居，读书奉母，不复仕”。这里所奉之母，乃是叔母章夫人，不是本生之母。

徐友兰和兄树兰一样，也是一个受新思潮影响颇深的新派人物。他一生主要从事工商矿业。《徐友兰传》中记载了他这方面活动的三件大事：（一）是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在上海开设机器缫丝厂。（二）是与其徐树兰一起在上海参加了农学会，从事开辟农业试验场、进行农业科学试验的工作。《传》云：“戊戌，……于黄浦之滨，置地百亩，广求各国果种，辨其土宜，次第树艺，以资实验。”（三）是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，“爰与同志二人购湖北矿山亘六邑之境，将谋开采”；癸卯年（1903），他又入都与人商谈开办路矿之事，不久便去世了。

徐友兰的去世，与日俄在中国土地上开战有关，他是这次战争的直接受害者。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：癸卯年（1903），北京友人约他入都商谈共同开办路矿之事。事竣之后，他于十二月四日搭轮船南下，恰逢日俄开战，船不得不进入旅顺口暂避。当夜，“日本率舰来攻，炮霆弹雨，船客号呼不绝于耳。忽一弹越船首，伤人二，若炸在舱面，则全船靡矣。”（《徐友兰传》）次日黎明，俄人派一旗舰来引航入港，正鼓轮出口，突见巨浪直立，旗舰触水雷爆炸，若是客轮沿此方向前进，亦化为灰烬了。徐友兰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战争恐怖场面，突遭此难，被吓得了“惊悸之疾”。甲辰（1904）夏病危，以良医精心医治而稍愈。

乙巳（1905）夏，疾又突发，遂卒。

二

徐友兰“身兼学商两界，”即除了从事工商矿业活动外，就是从事藏书、校书、刻书的活动了。《传》中云：“至于为学，无书不窥，旁及书画，性好收藏，凡旧钞、精刻、石墨、古金、法帖、名画，有所见辄购度八杉斋中，如是者数十年。既往沪，复命长子维则广为搜罗，别辟精舍以藏之，名曰‘铸学斋’、‘述史楼’。择精要鲜见之本，镌诸梨枣，凡数十种。其未可单行者，辑为丛书。又复访求乡先哲著述，校而刊之，名曰《绍兴先正遗书》，凡四集。书皆提要勾玄，作为后跋，精识宏论，伍崇曜、鲍廷博不过是也。先生殆拙于商而取赢于学者哉！”

徐友兰的藏书处初名为八杉斋，他到上海从事工商活动后，命长子维则在家乡继续他的藏书活动，又建立了铸学斋、述史楼，以及熔经馆、熔经铸史斋等。他的刻书处为墨润堂，在绍兴郡城的水澄庵。他收藏金石书画的地方名曰石墨庵，还有孟晋斋为读书、抄书之处。

徐友兰嗜好藏书、刻书并非偶然。他的外祖父沈映铃（字辅至，号退庵）就是家住杭州栖霞岭的一个有名藏书家。徐友兰受外祖父熏陶颇深，亦雅好收藏。后铸学斋藏书散出，亦颇多归之于沈氏。沈氏后人沈知方在《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》自序中说：“搜罗所得，计先后收进秀水王氏信芳阁、会稽徐氏铸学斋诸藏”，“而徐氏铸学斋旧藏钞本，尤为精绝。”

徐友兰藏书、刻书的经历，文献缺征。其藏书目录，笔者所见有两种，一为《述史楼书目》一册，钞本，著录经部约二百五十种，史部约五百种，子部约五百种，集部约八百五十种，共两千一百种。依四库分部，部下不分类。著录甚简略，仅详书名、卷数、刊本，无著者；一为《述史楼藏书别录》一册，钞本，书口

有“铸学斋”三字。此目为徐氏清点藏书之簿，上多标以“准”字或“对销”字方印。有“准”字印者，为述史楼插架之书，有“对销”字印者，皆用墨笔涂去，已不藏于徐家。又，笔者尚觅见徐维则稿本《述史楼语古录》一种，书口有“铸学斋”三字，蓝竖格印稿纸，著录皆述史楼收藏古物之精骑。首列为“精本书目”九十九种，为徐氏藏书精华之精华，余皆为金石、卷子、碑刻、书画之属。

从钞本《述史楼书目》来看，徐友兰藏书不注重于宋元本，书目中仅元刻本《资治通鉴》二百九十四卷等五、六种，比较注重收明刻本、原刻本、钞本、稿本等。这些书也极宝贵。比如所藏稿本有《周易汉学通义》八卷、《春秋年月日通考》三卷、《说文义纬》二册、《广韵声类》二册、《声韵析疑》残本二册、《明诗选》八卷、《国朝诗选》十卷外编一卷、《雪鸿诗钞》一卷、《素心堂偶存》十卷等。明刻本中，有明洪武丁卯（二十年）刊本《黄杨集》二卷、明天顺七年刻本《校壩文集》七卷、明成化本《甫里先生集》十九卷、《刘文靖公集》二十六卷、明正德二年监本《历代通鉴纂要》九十卷、《止斋文集》五十二卷、明闵氏刊朱墨本《史记钞》九十卷、明刊巾箱本《东汉文鉴》二十卷等。明代刻本中，徐友兰所收毛晋汲古阁刻本极多。徐氏还注意收活字排本、日本刻本、日本活字本等。正如沈知方所说，徐友兰收书尤以旧藏钞本为“精绝”，这是最突出的一个特点。比如《述史楼语古录》的《精本书目》著录的九十九种书中，旧钞本多达六十二种，影宋、影元钞本、汲古阁钞本、天一阁钞本、明钞本等有十种。其余为元刻本、稿本、校本、明刻本。徐友兰和许多著名藏书家一样，不但喜收钞本，自家亦喜钞书。《述史楼书目》著录铸学斋、述史楼所钞之书近二十种。他的藏书散出后，所藏钞本为各藏书家所珍视。比如今人潘景郑（承弼）先生之《著砚楼书跋》就著录了徐氏钞本两种，一为旧钞本《行朝录》

三卷，黄宗羲撰，“自来藏书家只有传钞本，徐氏铸学斋校定付刊，由是流传浸广”。一为《埤仓集本附广仓》稿本。又，北京出版社最近出版的《析津志辑佚》，所据版本之一即为徐氏铸学斋所藏明初钞本，书内尚有明永乐大典馆签条数条，说明编撰《永乐大典》时即据此书。其后，此书久佚，铸学斋有此钞本传世，其价值之可贵，可想而知。大概徐氏藏书总数不下十万卷，堪为近代一大藏书家。

说到徐友兰藏书，不能不提及徐维则。徐维则是徐友兰的长子，字以愁，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与蔡元培为同科举人，所著书有《东西学书录》，1899年出版行世，蔡元培为之作序。他也和其父、伯父一样，讲究传播新学、西学。他是其父从事藏书、刻书、校书的得力助手，徐氏藏书目录亦由他手编而成。他学问颇深，徐氏铸学斋藏书题记一类文字多出自其手。惜民国年间采写的《绍兴地方志资料》无传，殆其时徐维则尚为生者，例不入志，其生平事迹知之甚少。

徐友兰铸学斋、述史楼藏书散出后，一是归诸沈知方的粹芬阁中。沈氏《珍藏善本书目》中著录徐氏藏书数百种，其中有不少为铸学斋、述史楼、初学斋自钞本，所有这些藏书中皆钤有徐氏藏书印记，间有批校及识语。一是归诸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中。据张氏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序，涵芬楼尝先后四次大宗得书，其中一次就是搜集到徐氏熔经铸史斋藏书。序云：

“会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之书将散，徐氏故子民居停主人，乞其介归吾馆，旋以十棧至，书固不恶。”

除嗜好藏书之外，徐友兰还喜辑、校、刻丛书。明清著名藏书家都有一个特点，即把所藏的善本、孤本、罕觅之本汇辑成丛书，梓行天下，公诸同好。一是为古人续命，保存先民的精神产品，一是满足今人的需要，沾溉学者。这是一个好的传统。尤其到清朝以后，各类大部头丛书有如雨后春笋般的相继问世。徐友兰

也继承了这一传统。他所刻之书，计有：

（一）《会稽徐氏述史楼丛书》一函八册，书名为徐维则所署端，扉页有“丛书之刻，自光绪壬午始，《卦变图说》一种，外大父沈辅之先生见贻，遂列诸首”等字。此书始刻于光绪八年（1882），终刻于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。计有五种：（1）《易卦变图说》，书后有其外祖父沈映铃（字辅之）所写跋文，是赠给他的礼物；（2）《说文系传考异》，汪宪著，书口有“八杉斋校本”五字；（3）《孔子家语证伪》十一卷，会稽范家相著，每卷后有“光绪十有五年会稽徐氏铸学斋刊稿本”等字；（4）《退庵剩稿》和（5）《退庵随笔》，均为其外祖父沈映铃遗著。

（二）《融经馆丛书》四函四十八册，十种，袖珍本，前有徐友兰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识于融经馆之北窗下的题记。

（三）《绍兴先正遗书》四函四十八册，十三种。此书始刻于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，终刻于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历时七载。

（四）《铸学斋丛书》两函二十册。此书刻于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为徐氏铸学斋最晚刻之丛书。五年之后，徐友兰去世。

以上几部丛书，选择之精良，校讎之谨严，刻印之雅丽，以《绍兴先正遗书》为冠。顾名思义，这是一部网罗绍兴先哲遗著的丛书，是一部地方文献。全书共分为四集：

第一集有四种，之一为《重订周易二间记》上、中、下三卷；之二为《重订周易小义》上、下卷；之三为汪辉祖《元史本证》；之四为邵晋涵《南江札记》。

第二集为卢文弨所著《群书拾补》三十六种，《群书拾补遗》三种，后附《群书拾补识语》一卷，署名为徐友兰所著，实则应是蔡元培校读该书时随手所作札记。

第三集三种，之一为王端履《重论文斋笔录》十二卷；之二为毛奇龄《蛮司合志》十五卷；之三为祁承燾《淡生堂藏书目》十四卷。

第四集四种，之一为邵晋涵的《四库全书提要分纂稿》一卷；之二为邵廷采《思复堂文集》十卷；之三为陶方琦《汉葺室文钞》四卷，补遗一卷；之四为黄宗羲《行朝录》十二卷。

以上各种书的每卷之末均署“光绪××年徐氏铸学斋雕本，××县×××人校”。参予此书校仇工作的有徐维则、蔡元培、王士济、蔡铭恩、田宝祺、马用锡、薛炳等人。其中，蔡元培、马用锡、薛炳等人后来也在其兄树兰创办的中西学堂任职。每种书刻竣，即附一篇徐友兰撰写的题跋。徐氏刻印此书不惜工本人力，务求尽善尽美。此书可视为清末所刻丛书之精骑，是徐氏铸学斋校刻事业的佳作。

三

蔡元培先生与徐氏兄弟都发生过密切关系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至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，蔡元培在二十至二十四岁时，由他的叔父蔡铭恩（字茗珊）介绍，到水澄桥徐友兰铸学斋，为其子徐维则做伴读，并为徐友兰校书。他借这个机会，博览了铸学斋、述史楼藏书，学问大进，打下了坚实的旧学根底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八月，他偕徐维则等数人赴省城应乡试，中第二十三名举人，徐维则亦中是科乡试。翌年春即赴京应会试，中进士，不久，他就离开了徐友兰铸学斋。这是与徐友兰铸学斋的关系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因戊戌变法失败，蔡元培从北京回绍兴，受徐树兰之聘，任中西学堂监督，至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因受学堂旧派教员反对而辞职。这是与徐树兰中西学堂的关系。

目前，在已出版的有关蔡先生的传记、年谱等著作中，均把蔡先生在徐友兰铸学斋中校书、读书误记为在徐树兰古越藏书楼中校书、读书了。造成这个讹误的根源是这些作者都误判了由肖瑜、黄世晖记录的两篇蔡先生口述传记资料。蔡先生的口述，都只是说到“徐家”或“徐氏”校书，并未确指到底是徐氏兄弟中

的哪一位家中。因古越藏书楼闻名于世，有些作者便遽尔判断为徐树兰，实则大误。蔡元培先生在徐家读书、校书五年，这在他一生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阶段。蔡先生之所以旧学根底雄厚，成为一个“兼容并包”的教育家、思想家，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关系。因此，对他的这段历史我们应该辨析清楚。

说蔡元培先生在这五年中校书、读书于徐友兰铸学斋中，而不是在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，是有凿凿事实做根据的：

第一，徐友兰铸学斋所刻的《绍兴先正遗书》中，有四种书系蔡元培所校，这四种书每卷之末均有署尾。如：第一集之二的《重订周易小义》，每卷末署“光绪十四年徐氏铸学斋刊本，山阴蔡元培校”；第二集之一的《群书拾补》、第二集之二的《群书拾补遗》、第三集之一的《重论文斋笔录》也均有类似的署尾。此外，第一集之四的邵晋涵《南江札记》，每卷末署“光绪十五年徐氏铸学斋重刊，山阴蔡铭恩校”。这就可以证明蔡铭恩、蔡元培叔侄校书不是在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而是在徐友兰的铸学斋。

第二，从沈知方的《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》中，尚可发现有三种经蔡元培批校过的书，由徐友兰铸学斋流入了沈氏粹芬阁。书目云：

《埤仓》辑本，附《广仓》三卷，会稽陶方琦著，有蔡元培批校，会稽徐氏铸学斋钞藏本；

《后汉书补逸》二十一卷，钱塘姚之骃撰，会稽徐氏钞藏本，有蔡元培朱笔批校；

《水笈补》三卷，兰上镜、曲化农、徐沁著，明天启惠耕堂乌丝栏旧钞原稿本，有“光绪二十二年假之徐氏铸学斋读一过，拈出三事，后学蔡元培识。

其中第一种后来又从沈氏粹芬阁中流出，为今人潘景郑（承弼）先生所得，潘先生为该书跋语云，“其书世无传本，此为会稽徐氏铸学斋钞本，栏外有‘古越徐氏孟晋斋钞本’九字，复经

蔡子民先生校跋，于此亦多匡正，殊可宝也。”（《著砚楼书跋》）这三种书都是铸学斋钞、藏书，蔡元培读过、校过，流出以后，为他人所重视，亦可证明蔡氏读书、校书确实是在铸学斋。

第三，蔡元培根本不可能在这五年中读书、校书于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。徐树兰虽开办了古越藏书楼，但并非正宗的藏书家，他既不校书，亦不刻书，不可能请蔡元培校书于其家。况且，据张骞《古越藏书楼记》，此楼的筹建工作集议于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告成于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这要比蔡元培在“徐家”读书、校书晚十余年。

徐友兰铸学斋、述史楼藏书、刻书均很精雅，但不知何故，其名不仅为后世所少知，即使与之同时稍后、交游极广的近代大藏书家李盛铎（字叔微，号木斋），也不知绍兴有一位徐友兰藏书、刻书的情况。当他见到稿本《述史楼书目》后，写了一篇题记云：

此书目一册，不知谁氏所藏，意当日必求售或托鉴定者也，茫不记忆矣。目中所列注重需用之书，不计校刻远近，然明刻秘钞亦间有一二，藏书至数万卷而名氏翳如，颇为惜之。目中钞本不知何人所钞，独有述史楼钞本者十余种，信摭一卷，题述史楼钞本，或即藏书人欤？姑记此以俟考。

藏书中省志有三，而浙居其一，府县诸志浙尤多，其余广东为多。意此人必浙籍而游粤者。

此记离友兰卒世仅十年，木斋即有“名氏翳如”之叹。他本想考清楚述史楼主人名氏、藏书情况的，也一直没有办到。他根据述史楼所藏方志情况，推断出徐友兰“必浙籍而游粤者”，是相当有眼力的。李盛铎尚且如此，后世人把他误判为古越藏书楼主人，就更不足怪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《求是》杂志编辑部